

新世纪江苏散文创作倾向的管窥与反思

王 晖

内容提要 新世纪江苏散文呈现出多维的创作倾向。努力拓展散文的表意空间,致力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表现、特别是以江苏为主体的江南地域历史和地域文化的考古式形象书写,成为其中的重要景观。学者介入散文写作、小说家或诗人的跨界写作,在凸显创作主体身份多元化的同时,有力提升了江苏散文的精神境界、艺术内涵和学理品位。坚守“真我书写”、坚持为“集体记忆”而写作,使江苏散文不仅严格恪守“诚”与“实”的散文文体本质,还呈现出更为阔大的书写意境。而如何提升江苏散文的全国影响力和竞争力、如何塑造其新的整体形象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反思。

关键词 新世纪江苏散文 紫金山文学奖 跨界写作

王 晖,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10097

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作为文学大省的江苏,不仅继续保持着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传统优势,其散文发展也呈现出良好态势和鲜明特点。对这种态势和特点的归结完全可以见仁见智,本文则主要论及紫金山文学奖获奖散文以及近年来江苏散文新作所透露出来的写作倾向,希望以此对新世纪十余年来江苏散文创作做一个管窥。

被誉为江苏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紫金山文学奖,是一个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评论、翻译、影视剧本、网络文学、编辑等奖项在内的区域性综合文学奖,自2000年第一届颁奖以来,迄今已达四届。这可以说是自21世纪以来江苏设立的最高文学奖项。除第一届为新世纪之前的作品外,其它三届的获奖作品无一例外都是近十余年来江苏文学的优秀之作,其中,每届散文类的获奖作品为5部(篇)。与小说和诗歌的作者构成有所不同的是,紫金山文学奖散文获奖作者的身份具有显在的广泛性——他们当中既有如艾焯、夏坚勇、斯妤、王建等从事散文写作的“专业户”,也有如费振钟、王尧、吴功正、诸荣会等集合评论家、研究员、教授、编辑角色在内的学者型作家,还有忆明珠、叶兆言、车前子、徐风、刘春龙、赵践、山谷等在主营小说、诗歌之外兼顾散文创作的作者。有人说,散文是文学的客厅。这些从不同领域汇聚于散文的获奖作者再好不过地印证了这一

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跨世纪和跨年代作家,其散文写作实践有的跨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有的甚至长达半个多世纪。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些作家和作品正是江苏散文、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这一文体创作的代表和风向标。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同时又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体,散文曾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独领中国文学之风骚,形成“三十年一轮回”的文体高潮之奇特景观。但要准确梳理和归纳散文的文体特质、流变倾向等等,却是具有相当难度的事情。因为与小说、诗歌相比,散文大都如袁宏道所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作者身份、体制建构、艺术传达、文体品位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多样性、灵活性、可能性和开放性。我们在考察紫金山文学奖获奖散文作品,以及新世纪以来江苏散文创作时,也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然而,倘若我们做一些进一步的更为细致深入的探究,也还是能够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创作现状里捕捉到其流变的某些共通性和规律性。姜建在评点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获奖散文时曾经指出:“许多作者不再满足于随性的、片段的、零散的写作,而是力求确立一个总体构思,并通过一个独特的视角进行全景式的有深度的富于文学性的书写,由此所带来的作品的整体感、厚实度和审美冲击力都是相当可观的,见出作者对拓展散文表意空间的有意识追求。”^[1]我以为,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紫金山文学奖散文获奖作品特质的一个重要认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评价也能够说明江苏散文在近十多年里的基本审美价值追求。在我看来,这种追求正在凸显江苏散文创作的一些重要的写作倾向。

二

致力于文化和历史的表现,特别是以江苏为主体的江南地域文化和地域历史的表现,无疑是新世纪以来江苏散文创作重要的写作倾向之一。其意义在于,在努力凸显中国文化的传承与革新之时,成为当代中国散文版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文化和历史的表达,是散文写作的传统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大散文”的兴起,使这一类型的散文乘势而上,绵延不绝。江苏散文创作群体中,夏坚勇、王尧、王彬彬等人或在一般哲理层面,或从个人的经历出发,或立足于现当代重要事件和人物,表达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感悟、反思,甚至批判。夏坚勇的两部长篇散文《湮没的辉煌》和《旷世风华》先后获得第一和第二届紫金山文学奖。出版于新世纪之初的《旷世风华》,与作者写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湮没的辉煌》基本格调几乎一脉相承。但相对于后者的散点透视,前者将视角主要集束在极富中华民族母亲河意味的“大运河”上。在由南向北、由古至今、时空交错、纵横捭阖的叙述中,作者站在历史、政治、文化、民俗、地理、心理等各种方位,一方面深情讴歌大运河为中华民族所立下的伟业丰功,另一方面又深刻而形象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诗性反思和批判。作品在写到大运河的漕运方式时,就有这样的文字:“历史上的大运河曾多次改道,漕运方式亦时有变革,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把南方经济中心和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连结起来,让南方供养北方。这种实物供养式的漕运制度,客观上压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了乡村中以土地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格局。在这种体制下,小民百姓们固然丧失了走向市场的欲望,就是官僚贵族们,他们聚敛财富也不是为了用于投资和发展再生产,而是把银子堆在仓库里,每年夏天搬出来晒晒太阳,寻求一种心理快感。……漕运就这样把一个封建的中国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让它在自给自足中陶醉、僵化,直至腐朽衰亡……”^[2]这正如范培松在谈到余秋雨和夏坚勇为代表的文化批判散文特质时所说:“这类散文站在文化立场上,以特定的文化视角来描写历史的文化情感,从中编织出一种文化理想。他们的经历使他们熟悉文化和文化批判的种种套路,对八九十年代

[1]详见《紫金山文学奖专家评审感言》,〔南京〕《新华日报》2011年12月6日。

[2]夏坚勇:《旷世风华——大运河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294-295页。

之交处于市场经济勃兴下的文化环境,他们痛感文化救赎的流失,痛感的反冲滋生了强大的激情,促使他们以启蒙和救赎的虔诚,用文化批判来捍卫经典文化的传统,重铸健全的文化人格。”^[1]当然,正如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言,这种感悟、反思和批判的逻辑起点,或者说观察与叙说的视角,十之八九也都离不开当下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语境。“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追忆和倾诉,从乡村重新出发,再返回大学校园。历史这根辫子早就被大家剪下来各自梳理。但我有自己的头发,而且也长得不短了,我有自己梳理的想法。”王尧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里所说的这段话,大抵是能够代表这类具有浓郁个人性和当下性书写的立场的。这就是从个人的视角出发,从个人的境遇出发,从个人的感受出发,谈论现实与历史的是与非、对与错,以个人的成长史和思想史映射一代人甚至一个时代的成长与思想历程。作者饶有兴趣地写到上大学时组织看“特批”的《魂断蓝桥》,还有逐渐风靡校园的通俗歌曲、武侠电视剧、披肩发、喇叭裤、牛仔裤等欧美和日本流行文化,站在今天的视角,反观过去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约束和开放之中。‘奇装异服’这个词逐渐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中山装逐渐从我们身上脱下,西装被倡导。当时的校服就是西装,是现在已经穿不出来的那种西装。斑杂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从不同的方面塑造和改变我们。”在此,作者以江南学人或文人所特有的气质,铺陈有关文化和历史的宏大叙事。这是所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特别是浸润于八十年代大学校园文化里的“天之骄子”感同身受的事情。作品从历史的细部唤醒我们头脑中正在沉睡或者即将沉睡的往事,使我们不能不去回味过去、正视过去、检讨过去,并凝视由无数个过去所造就的我们的今天。也许,这样看似极具个人性的“宏大叙事”才更加逼近真实的事实和思想本身。

而更多和更有特点的是,建立在地方文化和风俗描述基础上的有关江苏地域文化的艺术再现。譬如叶兆言之于南京文化、赵践之于苏州文化、刘春龙与苏宁之于苏中和苏北文化、徐风之于宜兴紫砂文化等。如果说,前者让我们领略到江苏散文建立在社会与文明反思、人类之终极关怀基础之上的忧患意识和视野宽度,那么,后者所给予我们更多的则是江苏散文的地域风采和人文个性。我们甚至可以将叶兆言、刘春龙、徐风、诸荣会、车前子、赵践、苏宁、陶文瑜、杜怀超等人的作品视作对于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记录,是独特的“非遗”写作。刘春龙的《乡村捕韵散记》书写的是其苏北兴化家乡沿袭千百年的传统的渔猎活动,它融技能、游戏、文化等多种元素为一体,呈现出丰富的地方文化意蕴。在作品中,渔猎活动可以是“技能”,它展示渔人的生活、艰辛和智慧;可以是“游戏”,它表现小小捕鱼高手们本真质朴的快乐和体验;也可以是“文化”,它标示着某种生存方式和地域性知识。亲历性、专业性和文学性使作者对此如数家珍,也使读者身临其境,读来趣味盎然。它不是渔猎教科书,但它讲述了许多渔猎的科学知识;它不是隔岸观火式有距离的书写,而是全心投入、融入野地的倾诉。它表达出对童年、往事的难以割舍的情怀,对其中消逝的带有闹剧游戏性质的美事趣事的淡淡之伤怀。“今天作家以地方性知识的记录与书写,凸显其‘地方’价值,以之介入当下社会和文化危机中,较之学理研究,或许提供了更多的想象和可能性。”^[2]像刘春龙这样专注于江苏地域文化和历史的考古式形象书写,其价值从小处说,可以是多样化地域文学写作的反映,是地域文化、历史和社会变迁的记录,是一种别样的文化“挽救”和“打捞”;从大处讲,这将会有益于江苏文学强省和文化强省的建设,甚至也将有益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化和凸显中国当代散文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而这对于中国散文乃至中国文学形成世界性影响至关重要。此诚如鲁迅所言:“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3]

[1]范培松:《中国散文史》(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07页。

[2]费振钟:《地方知识的文学书写——读刘春龙〈乡村捕韵散记〉》,[上海]《文汇报》2011年5月6日。

[3]鲁迅:《致陈烟桥》(1934年4月19日),《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学者介入散文写作,也成为新世纪江苏散文创作的重要景观。学者散文自中国现代以来渐成传统,涌现许多大家。而相比较于一般作家散文,学者散文其实是高难度写作,因为它不仅要有“情”,还要有“理”和“趣”,三者需紧密结合,且缺一不可。这就像余光中所认为的那样,学者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感性,更常出入于情理之间。我曾经把这种散文叫做‘表意’散文,因为它既不要全面的抒情,也不想正式的说理,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1]近十余年来,范培松、董健、吴功正、丁帆、费振中、王彬彬、王尧等江苏人文社科界的知名学者,创作了大量散文作品,以知性散文的姿态和话语引领江苏文坛,有力提升了江苏散文的精神境界、艺术内涵和学理品位。这些散文知性与感性结合,对历史、现实以及社会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具有比较强烈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色彩。“知识分子”概念本身众说纷纭,我觉得萨义德的看法比较能够切近其本义,他认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的人物: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我的论点是: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the art of representing)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而那个行业之重要在于那是大众认可的,而且涉及奉献与冒险,勇敢与易遭攻击。”^[2]与这一说法相呼应,知识分子写作的内核就需要镌刻进不同俗见、坚持真理、不畏权势、勇于面对等基本要素。丁帆的散文集《夕阳帆影》在20世纪“最后一抹夕阳就要逝去”的时候,回眸远去的文化帆影,追忆苦难、激情与纯真,写出了一代人充满五味杂陈的情感和人生况味。他在《追寻古典的夕阳》中写道:“全球性的现代文明使人类进入了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空,同时,物质主义所带来的文化弊病也被人们所痛陈。倘使物质文明需要人类以对大自然的破坏为牺牲代价,以人的洁净灵魂作祭祀的供品的话,那么,在两种文化的选择中,我们更向往古典的、自然的文化与人性。……现代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文化负效应,人在物的面前变得畸形委琐,自然在物质面前也失却了昔日的风采。所有这些,我们只能靠回忆、靠梦境、靠文学创作来再造。这‘白日梦’是人类的幸运还是不幸呢?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喜庆还是悲哀呢?”作者由独具江南古典人文之美的周庄和同里,以及汇聚自然精华之美的黄山、张家界、九寨沟等被人工化、商业化“污染”的现实,发出这样的感叹,足以表明其鲜明的知识分子立场。在当今时代,“体制‘收编’知识分子已经达到异乎寻常的地步。因此,‘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这些压力中寻求相当的独立”^[3]。这种“独立”,突出地体现在丁帆的《枕石观云》里。在书中,作者通过《你在哪里——精英文化的守望者》、《思想误植的背后》、《“五四”文化批判精神可以取消吗?!》、《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新选择》、《物欲时代的人性反思》、《在“清货的思想”和“慷慨悲歌”的激情之间》、《文化放逐后平面化写作带来的精神灾难》等篇什,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勇气、情怀和智慧,反思转型时期中国文化的失落和批判精神的萎缩,呼唤重建新的人文精神。王彬彬近年所发表的有关中国现代史上国共关系问题的系列作品,不仅视角独特、资料翔实,而且在力避偏见、去除陈见、努力呈现真相上,显示出相当的勇气,表现出其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应有立场和风格。他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谈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争夺知识青年的作品里,对战争环境里国民党方面坚持常态教育的做法给予肯定,他写道:“蒋介石支持下、陈立夫主持下的高校迁徙,是抗战时期的奇观、是国民党主政大陆期间的大手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壮举,是人类教育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什么时候想起这决策、这艰难的过程,什么时候都对主其事者心生敬意。如今,再有偏见的人,政治立场再不同的人,也不得不对这件事表示肯定。”^[4]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坚持客观公正的信史原则,还历史事件以真相,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董健

[1]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广州〕《羊城晚报》1994年7月24日。

[2][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18页。

[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1页。

[4]王彬彬:《延安乎? 西安乎? ——抗战时期国共对知识青年的争夺》,〔南京〕《钟山》2012年第3期。

的《跬步斋读思录》、吴功正的《走进台湾》、费振钟的《黑白江南》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契合着学者散文的情、理、趣,使新世纪的江苏散文更具人文关怀和现实精神。

散文本是文学的“客厅”,文学门类中的小说家、诗人、影视剧作家,甚至文学编辑等都可以在此聚会。在新世纪江苏散文创作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一现象的存在。江苏从事专业散文创作的作家较少,大多为小说家或诗人的跨界写作。时至今日,跨界写作已成常态,作为小说家、诗人和编辑家的范小青、黄蓓佳、叶兆言、朱苏进、苏童、贾梦玮、车前子、刘剑波等人的创作即是如此。不可否认,当下江苏散文的跨界写作正是对中国现代散文创作重要传统的继承和光大,它在使得散文风格更加多元化的同时,大大增强了江苏散文的文体表现空间,使长于抒情和写实的这一文体形式更增添了诗意之美、叙事之巧和结构之丰。擅长于小说和诗歌等文体的作家们,在不经意间也从另一个侧面确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凸显其优势文体写作形象的同时,已经显示或正在显示其成就全能“文学家”的潜质。

三

近年来,《钟山》杂志所发范培松的《南溪水》、刘剑波的《姥娘》、王彬彬的《杨明斋:一个山东农民的理论雄心与悲剧命运》和《1927年3月24日的南京惨案》系列非虚构文本等长篇散文作品值得关注,它们在继续凸显上述所言江苏散文的写作倾向的同时,还体现出更为阔大的书写意境,这就是坚守“真我书写”、坚持为“集体记忆”而写作。

“真我书写”强调的是散文的非虚构本质,它既是对作家主体“诚”与“实”的要求,也是对散文文体基本风貌的规范。“就散文本身的禀性而言,它应该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存在之意义和价值的人们,从内心深处所迸发出来的一种自由自在的宣泄,渴望着能够表述出自己对于人世与宇宙的说不尽的印象与体验,倾诉着许多藏在自己胸膛里的令人关怀与憧憬的情思,跟多少热忱的读者朋友们平等地进行交心和对话,从而就产生了这种满含着真情实感,充分表现出具有完整个性与情致的作品来。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必然是标志着对于人性解放及其终极命运的热忱探索与追求。”^[1]我们不妨将林非的这段话看作是对散文“真我书写”的一种比较贴切的诠释。作为散文写作永恒的主题,“真我书写”还意味着不是仅仅局限于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的描写,以及在自我天地里的自由驰骋,它更需要有对于社会文明的反思和思考,有人生关怀、人性关怀和人类关怀的博大境界。这又自然地要求当代的散文要为留存当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而写作。否则,便是或无关痛痒、或无病呻吟、或功利作秀的文字。当然,这种“集体记忆”应当建立在文本之外的确定无疑的事实基础之上,而不是叙述话语的“重构”。近年出现的梁鸿的非虚构文本《中国在梁庄》所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而《南溪水》、《姥娘》等作品的书写倾向也在于此。一方面,它们并非单向度、单一层次的个人或家庭历史的描述,而是具有比较大的阐释空间并极富张力。《南溪水》涉及的是一个人的成长史,它的核心指向其成长的动力源(父母、环境、社会和文化)、成长的困惑与艰辛、成长的精神支柱等等。作者以自己出生地的“南溪水”为坐标,以父母和“我”等家庭成员的命运为描述轴心,从自己的幼年一直写到三十而立之年,其间跨越了中国现代社会最为激荡的战争、建设和动乱时期。作者在深入细致地描绘出时代的大变革、大改变的同时,又强调如“南溪水”一般的父爱和母爱的亘古不变——“这就是我爸我妈,天下最普通的爸爸妈妈,但又是让我这样的一个农家子弟真正站起来的爸爸妈妈,他们依然活着。”这两方面的交织,就使《南溪水》的意蕴远远超越了一个人的成长史,而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看到历史。《姥娘》则由养老(赡养)问题,扩展至对于临终关怀(人道

[1]林非:《中国当代散文史·序言》,见张振金《中国当代散文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主义)、道德伦理、家庭关系、历史变迁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的思考,由一个人的命运写到家族历史,再到复杂多变的社会变迁等。可以说,它们都以毛茸茸的细节清晰的小历史反映出气势恢宏的大历史与大变革的轨迹。这正是突破散文表现的狭小天地,努力拓展散文表意空间的全景式深度书写。从另一方面看,这些作品都遵循着严格的不虚美、不隐恶的非虚构叙事伦理。《南溪水》将作者对于父母的真情和深情融入严格的写实当中,“凝固的笑容”、“妈妈喊我回家”、“锦衣军”、“生死之间”等章节极具震撼性。《姥娘》在多个章节检讨作者本人和父母等家人对待姥娘的态度和行为,显示出严厉的自我解剖和批判。如作者认为自己是“道德主义骗子”、“自私自利之人”、“伪善者”等等,颇具巴金《随想录》、老鬼《我的母亲杨沫》等作品的文字风格。其真实的亲历性造成了极强的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

应当说,正是以上所述多个写作倾向的凸显,使得以紫金山文学奖获奖散文作品为代表的江苏新世纪散文获得了新实绩、新空间和新境界,使我们有理由为江苏当下的散文发展雀跃与欢呼,为其未来的流向夯实信心。当然,相比较江苏新世纪小说的辉煌,其散文创作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和突破。譬如,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下的文学创作不应以获奖为唯一目的,但事实上,获奖与否,获奖层次的高低与否,仍然是评价作品的一个重要维度。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就是,江苏作家夏坚勇于1997年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为江苏文学争得荣誉。但自此以后直至今日,江苏本土作家却再也无缘鲁迅文学奖散文奖。而作为目前全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的鲁迅文学奖,其散文获奖作品大多代表了这一文体在一个时期之内的最高水平。新世纪以来,江苏散文创作处在一个高位运行,但却又无缘鲁奖,这对于文学大省的江苏,似乎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检讨与反思——如何提升江苏散文的全国影响力和竞争力,如何占据全国性文学大奖散文奖的一席之地,如何塑造江苏散文新的整体形象等等。另一个问题是,相比较小说研究与批评,目前江苏当代散文研究与批评的力量比较弱,未能很好地起到推动散文发展的“轮之两翼”的作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苏散文研究与批评的力量并不虚弱,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全国散文研究与批评的重镇。当时,苏州大学、扬州大学范培松、王尧、吴周文、曾华鹏、张王飞等为代表的学者,以他们堪称深入严谨广泛先锋的研究成果,构筑了江苏散文研究与批评的雄厚基础,与北京、福建等省市形成全国散文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而目前,尽管江苏高校和社科院系统文学研究的力量实力雄厚,居全国前茅,但尴尬的事实是,大部分文学研究者都不是散文的专业研究者,在全省范围内仍在进行散文理论研究和批评的,仅有范培松、丁晓原、王尧、张宗刚等极少数中老年学者,“70后”或“80后”青年散文研究者和批评者寥寥无几。这种状况不仅与江苏散文的发展不相协调,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散文创作失却了推波助澜的助推力。我以为,在全国文学研究的版图中,散文研究与批评本来就处于比较边缘的弱势状态,江苏散文研究完全可以乘势而发,在已经成为全国散文研究重镇的基础上,通过高校、作协、社科院等不同系统所共同构筑的话语平台,整合各方资源,发挥传统优势,培植新生力量,力争在全国散文研究与批评中获得更大话语权,并在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中,推进江苏散文新发展,重塑江苏散文新形象。

[责任编辑:平 啸]